

香港貧窮系列之三：

香港貧窮狀況：從隱形到浮現

黃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九十年代的香港貧窮

八十年代初經已有學者提出香港社會經已出現「富裕中的貧窮」，周永新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指全港約有 13% 住戶處於相對匱乏的貧困生活之中。在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末，香港經濟出現高速的發展，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85 年的 74,524 元增至 98 年的 189,621 元。但貧窮問題並沒有隨經濟發展而減退，反而出現嚴重惡化的趨勢。在九十年代中香港不同學者提出多項有關香港貧窮的研究，這些研究對貧窮有不同的定義或量度方法，但其結論及共識是香港的貧窮問題相當嚴重，有超過六十萬人即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香港的貧窮問題從未獲得真正的解決。但無論是政府和市民均並未意覺貧窮問題的嚴重，香港的貧窮長期處於「隱形」的狀況。香港的貧窮真實狀況如何？為什麼香港貧窮問題會隱形呢？

香港有不同類別的貧窮者，有些貧窮者的存在比較明顯，如老人、失業人士的貧窮的問題比較受社會重視；亦有些貧窮者的問題比較隱蔽，如婦女及有工作的貧窮者的問題便較少受到關注。過去我們多認為貧窮者多是「老弱病殘」等人士，多是由於其缺乏工作能力而導致其生活出現匱乏，但除了上述人士外，不少「新窮」是如單親婦女、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是由於其工作機會被剝奪或被排斥，或遭到多重的壓迫和剝削而導至其貧窮。

香港貧窮戶的狀況

筆者與李劍明曾在 1999 年至 2001 年接受了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資助進行了「香港貧窮線研究」，成功進行抽樣調查，訪問了 3086 個低收入住戶，了解這些家庭的開支模式及生活狀況。香港貧窮線研究採用入息替代方法，利用恩格爾曲線的轉折點來定義貧窮線。恩格爾曲線是指住戶食物開支佔住戶總開支的比例隨住戶總開支的變化。有關的轉折點代表住戶對食物的邊際消費意慾的減慢。在轉折點之後，住戶不會繼續增加食物的數量，轉而購買較高質素的貨品或其他非必需品，以進一步改善生活質素。所以該轉折點表明有關住戶的消費模式由以購買食物這必需品轉為可以選擇其他貨品，這便成為分開貧窮與非貧窮家庭的界線。我們發現香港恩格爾曲線的轉折點的明顯在人均開支 3750 元，所以，我們便以住戶人均開支 3750 元作為為香港的整體貧窮線。

根據統計處在 1999/2000 年所進行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全港共有 449,000 個住戶的人均開支少於 \$3,750 元佔全港住戶的 28%。這是我們以開支模式對香港貧窮戶數目估計。與一般的形象和想法不同，貧窮戶並不是以領取社會保障、新來港人士、和沒有勞動力的家庭為主。有 57.7% 貧窮戶並沒有接受任何的社會保障援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高齡津貼。有 71.3% 貧窮戶家中並沒有任何新來港人士(居港少於七年)。有四分之三的貧窮戶有一名以上的勞動力，有三成半多有一名成員工作，有四分之一有兩名成員工作，有一成多甚至有三名成員在工作，只有四分之一貧窮戶並無有任何成員工作，可見無任何勞動力的貧窮戶屬於少數。由此可見，並不是貧窮戶的工作意欲低(所謂懶人)，令其勞動參與率偏低造成其貧窮，反而是經過九七年經濟低迷後的減薪，不少勞工的工資愈來愈低，工作愈來愈不穩定，其收入下降至貧窮線之下，造成「在職貧窮」(working poor)的現象。

根據我們的調查，處於上述貧窮線以下的住戶的人均總開支每月平均只得 \$2,520，食物的人均開支的平均數是 \$1,058，以每月 30 日計，即每人每日的食物開支只得 35 元。以這樣微薄的金額，要自己在家裏煮食也不容易應付，但不少貧窮人士由於工作及上學的關係必須在外間進食，所以在家的食物開支進一步被壓縮。所以，當貧窮戶有更多的收入時會增加其食物開支及比例，出現了恩格爾曲線在轉捩點前向上升的情況，顯示為了應付緊張的開支，貧窮戶出現了「縮食」(食物不足)的情況，當他們每多一元的收入時，這一元花在食物的比例會增加。而最低四分一分位即全港約有十一萬三千戶的人均食物開支更少於每月 720 元，即每日食物開支少於 24 元的水平，其赤貧情況可見一斑。

雖然貧窮戶花在食物的絕對金額偏低，但食物開支佔總開支的比例卻偏高，佔總開支的 42%，加上住屋開支的 18%，兩者合佔總開支的 60%。貧窮戶只有另外四成開支約 1000 元來支付交通、教育、水電燃料、醫療等開支，其他開支的比例低亦反映住戶必須將主要支出放在必需品上，令其生活質素偏低。當貧窮戶被問及如他/她的收入減少一半會首先縮減那方面的開支，有六成貧窮戶表示會減少食物的開支，只有約一成表示會減少住屋的開支。而當被問及如果其收入增加一倍，他/她會首先增加那方面的開支，有五成表示會增加食物的開支，亦有三成表示會增加房屋的開支。由此可見，對於貧窮戶來說，住屋的開支更為必要，其彈性亦較少，屋租或樓宇供款必須要支付，反而食物的開支較房屋的開支有彈性。這亦解釋了由於為了要支付較高昂的住屋開支，所以貧窮戶被迫要縮減食物開支，造成恩格爾曲線先升後跌，出現轉折點的情況。

貧窮戶在被訪之前的一個星期曾出現下列的貧窮狀況。有四成貧窮戶曾「因慳錢而唔搭巴士」；有三分一貧窮戶曾「因為經濟問題而經常唔開燈」；有三成貧窮戶在新年時曾「因經濟問題而無派利是給親友」；有四分一貧窮戶曾「因慳錢而等街市快收檔時才買菜」；有兩成貧窮戶「有家庭成員沒有自己固定睡床」。在以上五種貧窮狀況中，有四成半貧窮戶出現一種貧窮狀況，出現二至

三種達三分之一，更有一成出現四至五種貧窮狀況。可見其貧窮狀況的嚴重。更有少數貧窮戶連醫療及食物等基本生存權利亦因為貧窮原因而不能維持。有近一成貧窮戶「因經濟問題，有病也沒有買藥食」，以及每十五戶貧窮戶之中便有一戶「在過去一星期內有最少有一餐唔夠食」。以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仍然存在這樣大量貧窮程度這樣嚴重的住戶，情況令人震驚。

隱形的香港貧窮

無論是政府與市民均很少認真對待貧窮者及其問題，首先，香港貧窮問題的隱形與政府對貧窮的看法及其統治哲學有直接關係。香港政府從來不承認香港的貧窮問題嚴重，亦傾向將貧窮問題的原因視為個別貧窮人士本身的能力的缺乏（如老弱病殘等人士）或意識問題（如缺乏工作動機）所造成。政府宣稱成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後，香港社會已經成功地設立安全網，再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貧窮問題亦因而基本解決。再者，港府更認為政府以透過大量的社會服務如房屋、醫療、社會福利及教育為低下階層進行了大量的補助，所以社會政策經已有一定的財富再分配作用，減輕貧富不均的情況。港府不承認香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及忽視其結構性的成因，這明顯服膺於其「積極不干預」統治哲學。

香港政府宣稱本身的統治哲學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一直強調政府不要過份積極介入經濟，政府的開支預算強調要量入為出，政府的開支增長速度必須以香港整體增長速度為限，而且亦要避免公營部門過份膨脹佔用私營部門的資源，港府有意識地將公營部門的開支限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15% 至 20% 之下。很多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視香港政府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的典範。他們相信一個弱勢不干預的政府是讓自由市場去調節經濟以達至經濟繁榮。儘管這弱勢政府的假設並不能通過細緻的檢視，但這統治哲學卻成為政府強調要「創造財

富，而不是要分配財富」的基本論調。政府有意無意之間經常強調香港經濟整體增長的成績（增長財富的成績），但卻忽略個別社群未能分享財富，處於貧窮的事實（分配財富的結果）。這施政哲學令官員習慣將貧窮的事實掩蓋在繁榮的地毯之下，貧窮變成是微不足道或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所以貧窮不會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要議題，只有當貧窮引起社會不安和動盪時，才會引起政府的注意。

受干擾的階級形成

不單是政府並不意識貧窮的存在及嚴重性，香港的市民對貧窮的意覺並不構成行動，市民雖感覺貧窮的存在，但並未構成集體的不滿意識及導至廣泛的集體行動去改變貧富不均的社會分配。換句話來說，香港低下層市民的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並不強烈，貧窮問題亦因此處於隱藏的位置。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可說是一個不斷受干擾而從未完成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干擾因素是不斷有新來者加入成為香港勞工的一部分。在四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及七十年代後期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八十年代開始有大量亞洲家庭傭工加入，至九十年代再有新移民家庭經團聚來港、外來勞工及非法勞工的出現。更重要的是這些香港勞工階級的新來者通常佔據著勞工階級中最脆弱的經濟位置，而對那些原本佔據這些最低層位置的先來者產生替代的作用。這些來自中國的「最新」移民，其階級位置及處境與西方國家中的少數族裔的情況相近，由於被排斥，這些新移民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中。而亞洲外傭、合法及非法外勞更因政府的入境政策防止其在港落地生根，加上其客籍勞工或地下經濟活動的身份，令他／她們的社會及經濟位置有別於本地工人，所以很困難與其他工人組成有機的勞工階級。

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預的另一原因是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不少工人作為生存策略或為增加本身的利益而變成自僱者或小老板，他／她們在香港安頓及有一定積蓄後，在家庭的協助下便開辦小企業。他們「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以及波動

的階級流動經驗，防礙這些早期移民發展出激進的勞工階級意識，反而發展出一套「不定形」的階級意識。微觀層次中個人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亦形成為宏觀層次中社會滲透性的階級結構。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受著受干擾的另一個原因是工會運動中作為勞工階級的組織者受中國的政治所影響，其組織者不斷離開香港或工運的行列，令香港工運多次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缺乏中層組織者令工會的基層組織弱化，缺乏廠部的組織及鬥爭經驗，是造成宏觀上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而及在微觀上的階級意識不定型的重要因素。

由於勞工階級的形成受干擾，及其不定型的階級意識，香港勞工雖然感受到貧窮的困苦，但多數時候並未將之視為資本家剝削的結果，並未視之為勞工階級集體所面對的社會結構問題，反而很多時採取個人或家庭的生存策略（勤力工作，努力讀書，想方設法掙錢）來應付，希望有朝一日能向上流動，脫離貧窮的行列。所以貧窮的經歷成為只是個人的經驗，並未成為社會運動或社會組織的動力，貧窮在社會運動及社會組織上只處於若隱若現的狀況。

九十年代貧窮者意覺的轉變及發展

但上述隱性的貧窮者意識，隨著九十年代貧窮狀況的惡化及長期化，逐步走向顯性，及開始視貧窮不是個人原因而是基於社會原因，而且窮人亦較多對生活不滿。九十年代初，王卓祺曾以主觀社會指標來了解香港市民對貧窮狀況的主觀感覺，有 8.9% 被訪者認為香港貧窮人口低於一成，而分別有二成三及二成的被訪者認為貧窮的比率是成半至三成及三成至五成，可見大約有四成多的被訪者認為貧窮問題嚴重。隨著九十年代末，香港貧窮問題的惡化，有更多市民認為貧窮問題嚴重，王卓琪及王家英在 1998 年發現有 66.4% 被訪者認為香港的貧窮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認為不嚴重或非常不嚴重的只有 26.9%。調查亦發現有 81.6% 的

被訪者認為貧富差距嚴重或非常嚴重。調查另一重要發現是有 59.7% 被訪者認為香港貧窮問題主要是因為社會因素，只有 13.5% 認為是個人因素，認為兩者一樣多的有 22.2%。這結果與劉兆佳及關信基在 1986 年進行同樣調查的結果出現很大的轉變，當年認為貧窮成因是個人因素的有 31.4%，而認為是社會因素的有 34.7%。明顯地隨著九十年代貧窮問題的惡化，市民對貧窮的意覺亦比前增加，市民意識到貧窮的存在，亦認為貧窮並不是個人因素而是社會的因素所造成。

王及王的調查亦發現香港人存有「自求多福」的自助意識形態。有 70.6% 被訪者認為靠自己努力最能解決個人生活需要，另有 18.6% 認為是靠家庭成員間的幫助，只有 4.7% 認為是政府提供福利。這表明被訪者不依賴社會福利的心態是最清楚不過的。但調查亦同時發覺年齡大、低學歷、低收入、非專業及公屋居民等較多不滿意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及感覺個人生活需要較為不足。所以上述自求多福的心態並不適用於所有市民，尤其是這一群貧窮人士之中，可見貧窮者亦逐漸加強其意覺，認為政府應解決他們的貧窮的狀況及需要。可以說九十年代貧窮者的意識逐漸由隱性走向顯性，慢慢在社會上浮現出來。